原翻译文件地址：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0/22/%e8%ae%ba%e5%9f%8e%e5%b8%82%e6%b8%b8%e5%87%bb%e9%98%9f/>

原文地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119035230/https://struggle-sessions.com/2019/10/07/on-the-urban-guerrilla/>

鉴于中文翻译原本部分关键概念质量过差，特此个人重译。

**论城市游击队**

Cathal  
二〇一九年十月

“至于欧洲的武装行动，我们看到了持久的武装斗争。它们是客观现实的表达。因此，任务不是谴责他们，而是要理解、研究和分析他们，看看他们如何表达旧欧洲也存在革命形势的事实。除此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拿起武器的人，他们认识到这是夺取权力的唯一途径。这是对修正主义的有力打击，因为在欧洲，修正主义的堡垒之一，修正主义开始被抛弃。无论斗争达到什么水平，还有多少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1988年

引言

关于人民战争理论，它的普遍性及其在地球上每个国家的适用性，都已经有很多讨论。对峙双方的辩手都将在辩论中谴责和捍卫城市游击战的经验。我们打算以不同的方式，即对数场重要的欧洲城市游击运动进行更详细的阐述，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更清楚地表明我们所坚持的毛主义的唯一立场：人民战争是普适的，我们建议研究挪威和德国的公开文件以对这一问题有更多了解。

我们发现，许多谈论城市游击队的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要么对特定现象的理解不足，要么对马列毛主义的理解不足。这个问题适合于各种右翼和左翼机会主义的解释。

学习而非谴责

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急于彻底贬损欧洲城市游击战的整个时期。他们坚持认为，客观条件就是不允许，好像意识形态、毛主义本身只是小事一桩，只要存在“革命形势”，持有任何想法的任何人都可以革命——而不需要意识形态、战术和战略。更重要的是，站在右倾立场上的批评家忽视了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从过去的失败里吸取教训的必要性。

最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NDFP）网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所持的右派观点。菲民阵因其在国际上支援修正主义的行径而受毛主义者的批评。为了指出这些最常见的右派立场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看一下它在哪里是正确的。确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直到1980年左右之前都没有进入战略进攻时期，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城市游击运动都达到其顶峰，包括诸如爱尔兰、巴斯克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等。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的武装集团，一方面受到条件的限制，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客观条件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阶段急速跨越式发展的产物。尽管如此，贡萨罗主席坚持认为这些团体的存在说明了作为修正主义堡垒，旧欧洲的现存革命形势，他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自然，我们坚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时代为各国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无一例外。

历史上，阿瓦基安和他的支持者对城市游击战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这并不是为了坚持群众路线（他们已经明确拒绝），也不是为了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们一直未能系统性的提供），而是为了灌输他们的长期合法斗争和短期暴动理论——至少可以说，这个观点是教条和过时的，不过这一点也是证明美国革命共产党从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毛党的主要特征之一。尽管这种观点早在80年代就在美革共控制的《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杂志中流传，并被当作默认的常识性立场。这一观点有别于在本文开头的贡萨罗主席所表达的革命乐观主义。美国毛主义者已经直言不讳地表示需要克服阿瓦基安主义的残余，这些残余仍然困扰着人们，仍然在右倾机会主义者中流行。

马列毛主义已经具备了所有必要的理论工具，对城市游击队的经验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总结和综合。他们做对了什么？导致它们消亡的主要的理论和思想漏洞是什么？换句话说，它们的内部矛盾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正确和错误地应对自己的情况的？毛主义使我们能够避免不少城市游击队产生问题的地方，而非被其拖后腿。

通过这项简短的研究，而非全面贬损，某些品质就显现出来了，这些品质对于任何主张在帝国主义中心进行武装斗争的人而言，无论其立场如何，都是最有价值的。只有那些把群众的武装斗争理论化（即人民战争）的人，才能克服城市游击队的错误，达到更高的高度。相反地，即使只是错误的战略，如关于暴动的教条主义观点，也应当毫不妥协地被认识为试图取消武装斗争。我们的目的是坚持认为，双方的批评者都是从对城市游击的准确研究出发，而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鬼话或对武装斗争的恐惧。城市游击的真相一直被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所掩盖。让我们至少拨清一些迷雾。

意大利红色旅

“我们一直在打击人民的敌人，我们一直通过大量的斗争运动打击他们。”

——红色旅，米兰，1971

作为毛主义者，我们坚持意识形态不可放弃，所以在我们能够研究的各种组织中，一定要从可以说发展出了最好的意识形态的城市游击队开始。红色旅在明确表达他们的理论，他们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等方面要好得多，也因此他们从欧洲的所有“马列主义”城市游击队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与意大利无产阶级有着明确的、无可否认的联系，也因为他们与地上活动着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和劳工斗争有串联，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汽车工厂里。红色旅不像他们的德国同志红军派那样主要由学生、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相反，他们主要是从工厂工人转变来的士兵。

对游击中心主义的控告和它真正的劣根

红色旅不是游击中心主义者，他们甚至十分明确的阐明过。相反，他们依靠工厂基层作为“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这也为他们组织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尽管如此，他们依旧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要么受到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要么受到作为游击中心主义反面教材的团体的影响。

红色旅从第三世界的多钟渠道汲取斗争灵感，他们有时会因此陷入折中主义——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采取了正确且强硬的态度，同时也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即把对能把谁团结起来的主要考虑，完全建立在对议会外武装斗争支持的基础上——而无视战术、战略和意识形态。即使是那些对他们叫喊最凶的批评者，只要这些人在理论上对武装斗争有某种模糊的支持，红色旅也拒绝指责。必须把这一点认识为没让政治指挥枪——这一错误类似于游击中心理论的主要缺点。

红色旅深受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Tupamaros）的影响，乌拉圭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与毛主义者不同，图帕马罗斯将城市游击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在他们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义在拉丁美洲还没有被认识到是一种力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坚持，在20世纪60年代秘鲁同志在他们的党出现左倾时，谴责游击中心战略是正确的。贡萨罗主席所持有的正确路线是重建秘鲁共产党并开始准备持久人民战争。图帕马罗斯的错误在于他们对客观条件作出了正确的反应，却没有对他们的主观条件作适当的准备（这与城市游击队的解散者对欧洲经验的描述正好相反），实质上，这也是红色旅的根本性错误。对战后意大利的任何研究都表明，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处处成熟；红色旅的错误不是武装斗争。

过度借鉴图帕马罗斯和巴西人卡洛斯·马里盖拉的例子必然会破坏红色旅的潜力。尽管有这种局限性，由于对无产阶级的依赖，红色旅仍完成了很多伟大而成功的行动，这些行动依靠无产阶级的支持，且其在行动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无产阶级的支持。

通过武装对抗赢得大众支持

甚至在红色旅成立之前，他们的前身无产阶级左派（Sinistra Proletaria，SP）就在为无产阶级家庭组织住房斗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与修正主义者和合法左翼不同，无产阶级左派组织无产家庭无视使他们迷失和陷入困境的法律途径，转而与阶级敌人进行直接的和武装的对抗。他们教导群众住房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斗争的一部分，并以此巩固他们对住房的占领，并准备应对警察的进犯，这导致很多警察都住院了。与修正主义者们的表演和布道相反，这些策略非但没有导致群众疏离的不赞成，反而增加了群众的支持，最后，住房委员会让步了，并把房子给了工人们。无产阶级左派评论道：

“他们[无产阶级左派在住房斗争中成立的工人委员会]战胜了修正主义者和所有其他鼓吹温和、只想依靠谈判、指责斗争中的人们是极端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人民的假朋友’。各路修正主义者都说我们会被打败！但是我们成功了！人民的新法律获得了胜利！”[1]

当代对红色旅的评价

我们发现关于红色旅的英文文献中，少有从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其历史和经验的；我们承认，我们还没有完全研究过这一点，且我们必须与我们读到的内容（那些英文文献的观点）做斗争。最近加拿大学者、修正主义者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JMP）写了篇短文，尽管我们将讨论其中的缺点，但是它也有优点。在对Kersplebadeb和AK出版社（Kersplebadeb and AK press）出版的两本书：《打一教百》和《1978：一个阶级斗争的新阶段》的反思中，他正确地强调了红色旅所维持的群众联系，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左翼学者只关注意大利自治运动的倾向，这使它成为其最好的文章之一。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某些误解或可能的混淆，这值得纠正。[2]

必须纠正的第一个错误是，认为红色旅试图发动他们从未宣称要发动的“人民战争”的观点。通过像“持续革命战争”或者“持续武装斗争”这样的说法，他们与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的理论有重叠或者接近，但这种程度不足以将他们的武装斗争称为真正的持久人民战争，甚至当成是在持久人民战争的范围和方法方面发起它的一次尝试都不合适。我们做出一些让步，承认这样一种观点：红色旅创造性地应用理论，试图将类似于城市持久人民战争的东西理论化，但由于一些理论错误，他们没能正确地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将在下面概述这些理论错误。

毛主义的观点是，持久人民战争必须由共产党发起，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持久人民战争是不可能的，完全重建的党有尽快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历史责任。红色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他们的辩护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武装斗争并不总是持久人民战争，即便后者总是包含着前者——武装斗争可以先于党和持久人民战争存在，历史证明这是必然的。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坚持认为，缺少党是红色旅的阿基里斯之踵（致命弱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红色旅正在或者试图开展持久人民战争，这是缺乏支持论据的。我只想说，没有党就不可能有对真正可信的持久人民战争的尝试，但是肯定会有帝国主义中心的武装斗争经验，其中又有很多有用的教训，在这方面需要考虑的是，将现存武装斗争转化为人民战争之必要性，所以，党又是一个先决条件。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也会发生武装斗争，尽管发生的频率要低得多。这些爆发必须用于发动持久人民战争，而非糊涂的将它作为持久人民战争的替代品。

红色旅认为它可以通过武装斗争来建设党，这并非是不正确的，很多党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建设起来的，其中显著的有中共和秘共。起初，中共的成立会议上只有很少的代表，在全中国只有不到100个成员，按照毛的说法（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能回答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但是党仍然经历了指数级的扩张以及几近毁灭和劫后复苏——这全都是在通过武装斗争和最终的持久人民战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共已经认识到并把自己确立为先锋党。

另一方面，红色旅没有这种党的条件。我们遇到的事实是，他们没有试图“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建设党”，而是试图主要通过城市游击队运动的方式建立或者重建党。在此，我们必须理解两个概念，建设（building）的概念和建立/重建（constitution/reconstitution）的概念。所有的党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建设自己，没有任何党在开展任何形式的革命斗争后能够保持之前的质和量，因为一旦开始革命斗争，任何健康的革命党都会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成长和丰富，这是贯穿整个党的存在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建立/重建并不是贯穿党的整个生命的不断的、重复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是其得以持续“建设”的必要前提，建立/重建一旦结束，“建设”就立即开始。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不是语义学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错误、一个蒙昧主义问题，无论是否有意，都倾向于已破产的“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积蓄力量”的观念。可以说，一个尚未建好的党，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进行建设，直到通过建立/重建，实现从非党组织到党，从党的雏形到真正的党的飞跃——这也涉及将质的提高当做是首要考虑因素。

为了使问题更明确，党的建设只能发生在党存在的条件下，在这个条件之前，组织不是“党的建设”；它正将其自身建立或重建为一个党。在我们看来，JMP的方案是一个随意得出的结论，限制了我们对红色旅的错误之根源的探讨，这个根源是他们所寻求的是一种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东西——在发动他们有时称之为“持久革命战争”后，他们再建立或重建自己。此外，在武装斗争的条件下这也许有可能重建共产党，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拥有有关党的正确概念，而这是红色旅所没有的。

这个错误的概念，再加上无意识的受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在左翼城市游击队中无可比拟的潜力。通过战争来建设党是一个完全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几乎所有的经验中都被证明是可行的，但是在没有建立党的情况下领导革命战争，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的夺权取得任何长期成功的。

在文章的更新版本中，JMP改进了他的评价，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的分歧，因为这对分析红色旅非常重要，他总结道：

“对于那些熟悉秘鲁共产党‘党的军事化’概念的人来说，这甚至比这个概念还要退一步，因为这似乎是‘前党组织的军事化’[编者：基于有关这种比较的讨论，我应澄清，这主要是一种修饰上的差别，旨在表明当代的毛主义者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优于红色旅对此的理解。很明确，在它的早期阶段，红色旅对其前党组织的“军事化”事实上是成功的，并为其带来了力量。确切的问题在于，当红色旅进入了战略防御的军事阶段，它还没有党的机构，并希望在内战中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更准确的说，在没有先锋党建立计划的情况下，红色旅正式进入了军事阶段。]在1980年代，也许因为缺乏一个预先建成的可以控制枪的党——而相反的过程是枪在找党——红色旅的不同纵队发生了分裂，因此他们在受到国家的反革命攻势时更加脆弱。不过，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这种教训，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遗产。我们应该从那些追求革命的失败运动中学习更多，而不是那些因为从未尝试所以从未失败的运动中学习。”[3]

我们认为，JMP并不熟悉党的军事化，至少不够熟悉。当然，他说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必须指出和纠正的是，对党的军事化这一理论本身的混淆。红色旅构想了党和军队的完全合并，强行使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具合二为一，这是他们在前党组织时所遵循的模式，也是对他们未来的党的看法。这与党的军事化是完全不相容的。正如秘鲁共产党所正确坚持的那样，党的军事化是为了领导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调整和修改。不论是秘共的理论亦或是他们军事化的历史经验都认为党和军队不可以结合成一体——即红色旅所理论化的战斗共产党。与这种构想和JMP的错误理解相反，秘鲁共产党构想并实现了军事化的共产党，即围绕在党的周围同心圆一般地建设党的军队——比党自身更大。党是最高政治指挥中心，少数人聚集在那里，通过围绕着党而建立起来的人数比党多得多的军队，它能够开展其群众工作。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内容，我们推荐巴西同志的作品和一位前奥斯汀红卫兵同志的讲话，他们正是在呼吁对处于雏形中的党进行军事化。[4]

JMP的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对于前党组织的军事化对红色旅有利，而非有害这一认识，然而他没能明确肯定党的军事化是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组成部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因为，毫无疑问，一个非军事化的团体肯定无法做到红色旅所做的事情。这也被历史证明了，除其他事外，其中最突出的是红色旅很少被渗透。虽然大多数的修正主义组织，其中最主要是意共，坚持认为红色旅是警察的一个阴谋，充满了线人和渗透——事实恰恰相反，意共才是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中含有美国中情局特工的那个，这些特工通过诡计设法提供情报，导致意共兄弟党派中数以百计拉丁美洲人的死亡。[《打一教百》]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美国的修正主义者中，他们坚持秘密行动的毛主义者是由执行现代反间谍活动的特工组成，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考虑到这些修正主义者享有警察保护，几乎从未面临重大指控或镇压，而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毛主义运动有关联的人面临着近乎连续不断的指控和国家镇压，包括企图暗杀和不计其数的构陷、诱捕和监视等等。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由于组织而最易受渗透的趋于不会与政府发生冲突，也最少被分析；针对那些组织起来反对渗透和面临镇压的人，却去指控他们是国家特工，当然，这些指控永远没有任何事实证明。

只有部分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把我们对红色旅(或任何城市游击队)的认识超越一般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军事化的共产党与党军合并的区别，建立/重建和建设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捍卫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建设军事化的共产党；我们决不能把党和军队混为一个整体。

为了进一步说明红色旅的错误，我们必须研究1975年的文件《对国家心脏的猛击》，它试图从理论上证明把党和军队压缩为一个整体是合理的，当然，通过武装斗争来建设党是要推迟到以后的：

“游击战争的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像某些人解释的那样，‘在武装斗争的地带组织群众运动’或至少当下并不是这样。”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建成战斗性的党，作为‘客观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和军事所需要的真正解释者，在革命战争的众多战线上发展全阶级的战斗组织。”[5]

红色旅简洁地暴露了他们的主要错误，比当代或历史上的任何批评家都要好。在武装斗争地带组织群众运动是一项需要红军的严谨任务，只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军队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党全方面地指挥军队，它是军事化的但又是与军队不同的组织，这就是秘鲁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中所概述的革命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

相反，红色旅把党和军队混为一个整体，试图把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作为一个追求，而不是作为一种客观必要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游击战争或任何其他时期的群众路线都依赖于这一原则：群众创造历史，而党作为杠杆，必须领导群众。人民战争这样就纠正了红色旅的错误，剩下的就是从他们的成功中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从红色旅吸取哪些必要的教训呢？

首先，要了解他们对现代修正主义意共、意共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合作和在国际上的政治立场的观点。红色旅是无产阶级中一股真正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工厂内行动，直接反对企图破坏或粉碎车间斗争的意共干部，他们也反对残存的法西斯主义管理者和所有者，这在意大利很常见。这反映了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斗争的主要危险，认识到意大利共产党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大的、最强的没有国家政权的修正主义组织之一。现代修正主义与革命的矛盾创造了红色旅，没有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就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在统一战线上就会屈服于上述折衷主义。在这一切中最闪耀的一点是，红色旅作为撬动无产阶级的这一杠杆的能力，在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和改良主义方面采取了大胆的、得到了支持的行动。

在军事上，红色旅谴责了第三国际的暴动战略和游击中心主义，这是正确的。红色旅从意大利武装斗争的悠久传统中发展而来。这些斗争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接纳了修正主义后，大量的意共干部、基层组织以及激进的工人民兵仍然拒绝解除武装。它们具有持久的特点。对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武装斗争并不陌生，这使得旧共产党的背叛更具毁灭性。反法西斯抵抗战争未能发展成为人民战争，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陶里亚蒂和其他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叛徒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清楚，被现代右倾机会主义者贴上“冒险主义”的红色旅的行动实际上是红色旅的功劳。他们的目标通常是最受唾骂的，有时他们会审判人民的敌人，树立典型，作为有意识的宣传行动，比如，剃掉一个法西斯管理者的头，把他绑在一家汽车厂外的旗杆上，脖子上挂个牌子。这些活动增强了斗争工人的支持，加强了他们的信心。数百名工人举着红旗在管理者成为红色旅目标的工厂内游行的情况并不少见。红色旅认识到，意大利无产阶级寻求武装斗争，而这种愿望正面临着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扼杀企图。

对试图在工人阶级社区和工厂里打击和抵制法西斯影响的现代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红色旅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教训。在二战后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他们作为最激进、最发达、最有力的反法西斯力量之一脱颖而出。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当代左翼分子却非常乐意穿肮脏的无政府主义尿布，不管现实给了他们多少次迎头痛击。

武装宣传必须与“行动宣传”划清界限。前者利用革命暴力，争取群众支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形式。后者只是希望在没有组织表达的条件下，有组织地激发类似行为。我们可以理解，红色旅倾向于前者，而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后者。我们可以在秘鲁共产党对偷牛贼和强奸犯的早期审判中找到武装宣传的历史论据，这些人在人民法院完成审判后被处决。这些例子无一例外地出现在迄今每一场人民战争中，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发起持久人民战争的党和组织也能够为群众进行这样的审判和惩罚。必须理解，对罪犯的个别审判和惩罚本身并不会消除这种罪行的发生；必须明白，在获得政权和革命政府能够实施统治之前，仍会有偷牛和强奸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将继续下去，一旦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这些罪行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对象。这种讨论的价值在于，这种惩罚的作用是动员和激励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对反人民犯罪的威慑作用只是一种附带好处。支配这一点的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只会加强对持久人民战争普遍适用的论据。红色旅特别擅长武装宣传，认为这是任何游击队斗争打响第一枪的手段。

红色旅研究革命理论的真正意图是将普遍性应用于意大利的具体情况；他们对意大利和世界的许多分析领先于其时代，因此对所有革命者都有价值，而其他理论则缺乏彻底的科学性。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使用陈腐的教条，坚决地同一切企图用无休止的合法主义来扼杀革命的人决裂，甚至他们的失败也比合法主义者（包括自治主义者）所谓的成功更有价值。红色旅没有在他们的理论上走得足够远，无法找到正确的意识形态和军事战略。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完全理论化马列毛主义的毛主义，他们只能走到这一步，创造性地运用尽管是折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证明了在欧洲进行武装斗争的能力。与他们的成功相关的是，意大利是欧洲列强中更落后的国家之一；它仍然保持着法西斯时期天主教会培养的的高度反动，尤其是对妇女，在南部依旧存在半封建因素，以及广泛存在的对北迁到工厂工作的南方人的种族主义。这些条件有助于红色旅成为最成功的城市游击队之一。仅凭意大利的这些特点并不能使红色旅与众不同，是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倾向，和他们理论化和证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问题的渴望让他们与众不同。建议关心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武装斗争的人好好地研究和分析红色旅，这并不是什么大的飞跃；这对于使他们免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攻击是有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试图取消帝国主义中心的武装斗争。在任何分析中，我们都应该认为红色旅站在街垒的正确的一边。他们的错误是革命者尝试新事物时的错误。我们应该在持久人民战争的脉络中珍视它，就像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对巴黎公社的观点。

红军派

关于我们的办法，我们已没有更多的话要对你们说了，就像我们的行动计划一样。——你们这些混蛋！……你说冒险主义是什么意思？那次只能怪告密者，不管怎么说。”

——红军派，《建立红军》，1970年

红军派引用的毛泽东比引用的其他革命者多得多，他们的某些理论源于毛泽东。其中的主要内容最好理解为对正确思想的不正确应用，或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如红军派那样，坚持把实践放在知识积累中的首要地位是正确的，这对于发动战争来说也一样适用——因为这一真理，是理解红军派作为武装斗争的伟大试验的唯一途径。从毛主义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出发，红军派认为，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不可能将德国工人阶级与自己和进步的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的观点，有时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是，红军派幼稚、浮躁，更像是一个帮派；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但凡粗略地审视一下他们的理论，就可以看出他们高度关注马列主义理论，在伟人们中强调了毛。他们并非不关心具体情况，而是直接从对这些情况的理解出发，为自己的论点进行了高质量的理论辩护。

不像红色旅，红军派对维持和加强他们在德国无产阶级中的基础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在他们最重要的文件《城市游击队概念》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最初的组织观念是把城市游击队和基层工作联系起来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社区和工厂工作……学习。很明显，这行不通。”[6]

通过否定三大法则（三大法宝）以及紧随其后对毛主义的否定，红军派试图从理论上为军民分离辩护，而不是像红色旅那样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这一观点将持续不断的损害红军派，并且会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分离。

作为最有据可查的城市游击战团体之一，红军派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对待，我们只能交出自己最有限的概况。首先是它的特点，我们必须考察红军派的战士自我牺牲的一员，甚至放弃自己为人父母的权利，就像古德伦·恩斯林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那样，她们都是母亲，被迫在积极的母亲角色还是投身于地下战士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德国女性的普遍思想，即武装斗争是确保一个光明未来的唯一途径。组成西德工业和政府首脑的前上层法西斯分子的存在强化了这一思想。对于构成红军派的激进一代来说，战前政府和战后政府之间有着很大的连续性。传统的共产党被不断推行的法西斯政策所取缔和摧毁，这一事实只教会了年轻人一件事：枪是唯一的政治手段。对这此表示同情是理解红军派的必要条件，这一条件对于任何想正确对待他们的批评意见来说，是必要的。

爱尔兰共和军

“自1916年爱尔兰共和军成立以来，它就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强烈敌意并持续抵抗帝国主义的组织之一。爱尔兰共和军始终站在先进革命理论和游击战术的最前沿。”

——《爱尔兰共和军绿皮书》，1956年

最后，除了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问题。北爱尔兰仍然被英国所占领。英国是一个古老的殖民主义国家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但是，面对着这个帝国主义巨人，爱尔兰共和军能够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甚至是那些谴责欧洲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城市游击队的人在对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评价时也非常克制。任何人都不能无视英国对爱尔兰人所犯下的残忍暴行，就像不能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一样。

爱尔兰是英格兰的首个殖民地，是帝国的试金石。因此，爱尔兰人民造反不断，总是在不同时期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反击。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麻烦（troubles）上，但是对于城市游击战的教训来说，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半成功的爱尔兰独立战争，这是一场不能被敌人在军事上打败，不得不在政治上因国家的分裂而被击败的战争。这就是城市游击队诞生的地方。

消耗战还是持久人民战争？

爱尔兰共和军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了自身的游击战略：

1.以消耗敌军人员的为目标，尽可能杀伤敌军以便敌国人民要求撤军。

2.炸弹爆炸行动旨在使敌人的经济利益在我们国家无法获益，同时限制其对我们国进行的长期金融投资。

3.除了殖民地军事管制之外，使得北爱尔兰六郡在现在和过去几年都无法被管理。

4.通过国内和国际宣传和报道运动来维持战争以及为结束战争获得支持。

5.通过惩罚罪犯、通敌者和告密者来保卫解放战争。[7]

显而易见的是，游击战略缺乏更为先进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中具备的必要技术；它对于如何将游击战争发展为真正的战争，对于如何通过动员人民和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来粉碎敌人军事力量并使得敌人彻底失败，没有适当的认识。整个战略取决于这样一种希望，即当作战的代价变得高昂时，敌人会自行撤离。这种军事理论上的的失误必须被视为一种短视，这导致了历史上的谈判、不合理的妥协和投降。

正如爱尔兰共和军所表达的那样，消耗战的结果取决于哪一方拥有更多的资源，在实践中，这往往会倾向于毛所警告的“消极防御”或“专守防御”，这是持久人民战争理论所说明和克服的错误。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在北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准确的说，爱尔兰共和军在其最终背叛和投降议会主义后，于1969年至1998年前后进行了一系列消耗战。主要的考虑是，通过让民族解放力量在困难中生存，使英国无法忍受这场战争。这场消耗战承受的限制与对持久人民战争必须维持的考虑是重叠的，但与消耗战不同的是，持久人民战争的力量不断增强，不仅获得了群众的同情，而且从其对敌人及其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的能力中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通过其有缺陷的军事战略，爱尔兰共和军仍然能够在谨慎的平衡中进攻和防御，在这一过程中爱尔兰共和军能够开辟出一些飞地，作为群众支持的伪根据地。警察和军队害怕进入这些地区，共和军能够开始管理人民的日常事务。在这方面，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中有许多武装宣传的例子，甚至在游击战略的第五点中也提到过。

对于消耗战的依赖也促使爱尔兰共和军依靠同情的反英武装力量作为武装自己的主要手段，比如利比亚。这与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中将敌人当作补给线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方法相反。在这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从敌人手中抢夺武器，进而将非武装力量转变为武装力量的原则，是如何远远优于依靠国外资金支持和武器支持的。爱尔兰的斗争一直以这一缺陷为特点，在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的前身就依赖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资金支持并且经常依赖于爱尔兰有产阶级的施舍和恩惠，而不得不非常小心不采取太多社会主义行动来冒犯他们——这种以无产阶级利益为首的民族阵线的实施是非常失败的，其实质上将领导权交给了同样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上层阶级。

即使是在这一重大缺陷之下，爱尔兰共和军仍以穷人的支持为主要力量，以民族压迫为跨阶级联盟的基础。失业、种族主义和贫穷成为了爱尔兰共和军招募战士的土壤。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英军无法在军事中战胜爱尔兰共和军，却也一再证明其在政治中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了爱尔兰共和军。从国家分裂到《耶稣受难日协议》（译注，即《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订，英国政治的毒刺仍在爱尔兰人民身上，尤其是北爱地区人民，人们不愿投降；随着英国脱欧谈判的进程，武装行动仍在继续，群众造反正在增强。就连许多帝国主义政客也害怕武装斗争的继续加强会达到麻烦的水平。可以说，即使官方已投降，武装斗争仍未结束，因为要求武装斗争的条件从未消失。这遵循革命的普遍规律，源于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之间的矛盾的。

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有义务重建自己的党，爱尔兰也不例外，在完成重建党的目标之后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而不重蹈覆辙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特别是在麻烦（troubles）时期的经验，给所有革命者提供的，是对城市根据地的可能性的一瞥。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这些经验受到了限制，只有置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军事领导下，这些经验才能不受拘束。

爱尔兰共和军的一般教训

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和历史之中，有用的是城市为主、农村为辅的武装斗争的结合。贡萨罗主席的众多贡献之一就是统一人民战争（Unified People’s War）理论，它回答了持久人民战争如何应对特大城市和被迫从乡村迁移到主要城市周边贫民窟的农村穷人的现代状况的问题。这一理论直接适用于有着人口不断增多的特大城市的第三世界，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本身，以相反的方式进行斗争，即以城市斗争为主，乡村部分支持城市斗争。虽然爱尔兰没有特大城市，但爱尔兰解放力量几百年来主要在城市进行的战斗，对所有第三世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者都有客观价值。我们希望对他们经验的研究远远超越我们在这里所完成的。

毛亲自研究迈克尔·柯林斯的生平并非没有道理，这种研究提高了毛对于柯林斯所深化的游击战争的理解。在柯林斯背叛人民之前，他在爱尔兰促进了城市游击战；他了解反情报的价值及其与信息战的联系，他利用小型机动部队来执行行动，他坚持彻底的行动保密性，坚持大胆和非常规的行动。我们现代的怀疑论者可能会对毛对柯林斯的城市游击战技术的研究嗤之以鼻；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努力研究，而不是以这些为借口，以便将类似的概念应用到持久人民战争的理论中。虽然柯林斯的理论缺乏持久人民战争的视野，但是他的实践已经足够让英国感到恐慌并要求谈判，由于缺乏对胜利的坚持，随后的结果是国家的分裂，这是柯林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错误。与历史格格不入的是，有人认为：柯林斯和早期爱尔兰共和军发动的游击战争是有合适条件的，但是现在对于人民战争来说，这种条件在任何城市工业国家并不存在；然而人民战争要比任何单纯的游击战争更先进和完善。爱尔兰人民早已证明城市游击战的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长期合法斗争及之后的短期暴动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城市游击队的其他考虑

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下，我们已经开始概述一些正反例和优缺点，以便进一步讨论，我们欢迎不同的意见。我们绝不认为这是一篇深入的研究，因为这需要对所举出的三个例子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大量篇幅的论述。在全部这些的例子中，事实上，在所有城市游击队的例子中(除了存在于实际的持久人民战争中的那些城市游击队外)，都缺乏共产党领导下军队的某些特征，这必须加以考虑。

军队作为党的群众工作者：人民军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红军（资本主义国家，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社会工作对维持和发展群众联系来说是必要的。这在实际的持久人民战争之外的城市游击队的经验中是不存在的。而普适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已经解决了维持和发展群众联系的问题。

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规律出发，毛主义理论主张一种新式军队，这种军队主要从事与旧国家的斗争，同时也保持在生产中的作用，使其自力更生，防止寄生（于人民）。忽视这一原则会带来灾难，并阻碍城市游击队长期维持战斗的能力。对此的背叛会导致军队或革命力量在政治上投降，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会削弱其应对来自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击的能力，而这种攻击使其失去支持，被先进的反叛乱机构所围剿，并对旧国家进行政治妥协，这在本质上必须被理解为投降。

人民战争是分阶段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其自己的运作规律，误解这一点或完全否定这一点都会犯损害革命斗争的错误。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我们举例的所有三个群体都产生了影响，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三个阶段，他们无法相应地作出应对。这是主观的错误，不是革命活动“条件糟糕”的证据。“条件糟糕”的论点是被用来否定武装斗争的笼统的论点，但事实说明了，不正确的战略和意识形态，无论在第三世界或帝国主义国家实施，都注定要失败。图帕马罗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作战战略不能让他们取得成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或任何欧洲城市游击队的例子都是如此。没有人认为所举的例子之中有用人民战争实现的；事实是，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可以从他们各自的结论中拯救这些经验，并必须由革命者继续坚持下去。

与普遍人民战争的谴责者不同，我们必须对群众进行革命抱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共产党能够成为撬动群众的一个巨大杠杆，持久人民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取得成功，就像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样。我们决不会说可以照搬第三世界的持久人民战争或城市游击斗争的经验，或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条件下给它们打上橡皮图章，说能取得完全成功。（注：橡皮图章是一种政治比喻，指代某些法理上权力很大而实际权力很小的人或机构。橡皮图章几乎不会否决，或不能否决某些被要求批准的提案。）

我们的论点很简单，也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学习经验和理论，以便创造性地确定和运用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以适应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造反的权利，无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无助于民族解放斗争。从各方面看，合法斗争必须以掩盖和加强非法斗争为目的，这过去一直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将来也是，甚至更加如此。这一原则暴露了那些以臆想的“长期合法斗争”为基础进而攻击将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应用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人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我们必须警惕各种起义主义教条，认为列宁或毛在这个问题上有完整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观点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事实却相反，当条件发展时，这些伟大领袖的观点也跟着发展，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已经进入垂死状态，持久人民战争是唯一的前进道路。我们必须坚持群众参与革命战争，必须坚持只要斗争正确，小的力量也可以发展成大的力量——这些观点是符合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唯一基本规律的。我们希望能更广泛地讨论我们在这里所写的小组的理论和实践，并将涉及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团体，这是未来的一项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必须为关于持久人民战争的讨论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结语，与对80年代城市游击队陈旧的阿瓦基安主义观点的简短交锋

我们在1985年出版的杂志《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第4期中找到了几篇有用的文章，这是一篇笔名为P·贝克尔的文章，长篇大论地阐述了阿瓦基安派对城市游击队的机会主义观点。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知道P·贝克尔的实际隶属关系，他很可能他是美革共的成员，或者与美革共相当的成员。美革共即使不控制杂志的话，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在美国获得该出版物的副本，就必须通过美革共控制的革命书店。贝克尔的观点才是我们关心的，他的隶属关系比较次要。

在整篇文章中，“恐怖分子”这一词汇被用来形容每个城市游击队，使用这种资产阶级的谴责手段是没有革命根据的，这种手段也确实散发着美革共的腐臭。列宁用这一个词来形容他那个时代的各种力量，但作者与这个例子相去甚远。要清楚，恐怖主义只是所有革命者的武器库中的一个工具，对其进行超出战术领域的道德说教是没有意义的。有允许使用它的条件，也有阻止或禁止使用它的条件。就像暗杀和处决一样，将每个使用这些工具的组织统称为“刺客”或“刽子手”是道德说教和荒谬的。战术本身并不代表政治组织的主要特征。贝克尔的这种道德说教更普遍地暴露了对政治暴力的厌恶，革命暴力有时意味着杀戮，但是将革命组织称为“杀手”是反动的，因此他使用“恐怖分子”一词也是反动的。这同样不是语义学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分析的、阶级立场的以及宣传服务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的文章说：

“恐怖主义路线认为，对帝国主义机构和人员进行武装袭击，一般是主要任务，至少是革命力量从活动之初就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这些攻击是他们的战略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持久人民战争’。” [8]

这句话值得评论，首先，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西欧城市游击队中，从来没有一个声称正在进行“持久人民战争”。作者与阿瓦基安一致，只是尽可能声称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而这是在反对武装斗争。其次，如果作者确实研究了那些令人畏惧的西欧城市游击队的历史或文件，就会知道这些组织并没有把武装袭击作为出发点，正如我们上文看到的无产阶级左派（Sinista Proletaria），这些团体是在合法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发展到武装斗争的，红军派甚至直言不讳地说：

“在决定进行武装斗争之前，首先经历合法斗争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与革命左派的联系是建立在只想追随最新潮流的基础上时，那么那个人最好是不要开始任何让他以后无法脱身的事。”[9]

作者不仅错误地将人民战争的主张归之于城市游击队，而且还暴露出他甚至不理解应用于中国例子中的人民战争，他认为：

“从战略防御开始，逐步建立一支红军，配合游击队从农村根据地挺进，转入战略进攻，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政府。” [10]

这种糊涂的理解，忽略了人民战争有三个阶段，而不是两个阶段，即它依赖于取得双重政权，形成革命政府，革命政府在解放区作为一个新国家运作，这是在它向城市推进之前的。在贝克尔看来，游击队可以与红军“配合”，而不是作为其附属。也许是由于他忽略了需要精确对待历史上什么是人民战争的问题，就可以简单地将其含义扭曲到无法界定的程度。

当然，根据贝克尔的说法，帝国主义国家几乎从来没有革命形势，因为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阶级不断地被帝国主义的战利品收买！这种观点完全是反毛主义的，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反群众的，它不仅把群众视为妓女，甚至与现实不符。一切接近“存在一个工人贵族占多数的国家”的理论都是反革命的。例如，美国有世界第二大的制造业，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把世界第二多的无产阶级群体斥责为“工人贵族”，这就要求我们停止对辩证唯物主义和理性的一切理解。不需要用统计数据和贫困率来证明剥削在美国很猖獗，来让这篇文章陷入泥潭，而是要正确地说，如果存在工人贵族，当然这肯定存在，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更深厚的、更深刻的、更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贵族们与之保持距离，一个（阶层）的存在离不开与另一个（阶层）的联系。

贝克尔和他的同伴在左翼城市游击队和像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划定界限，为了进行这种划界，他只对后者如何获得群众支持或后者是已经存在的群众斗争的延伸作了一些模糊的评论。对于红军派以及利用武装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等团体来说，这种划分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已经详细讨论过的那样，当涉及到红色旅的大部分存在时期时，它离历史评价的水平还差得很远。

贝克尔坚持认为，爱尔兰共和军错误的战略正是他们被必须捍卫的确切理由，也是将他们从左翼城市游击队划分出来的地方：

“爱尔兰共和军的持久战军事战略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目标——将英国人赶出爱尔兰——也反映了这场斗争的民族性。由于这些原因，它一直能够获得持续的群众支持。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表面上）类似的战术则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些资产阶级无法被“赶出”自己的大本营，必须被彻底粉碎。”[11]

自1922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只要英国人形式上离开，爱尔兰就会自由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反动的。爱尔兰共和国在文化和经济上仍处于英国的主要控制之下，再者，1998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协议》包括英国军队从北爱尔兰实际撤出。任何对情况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应该清楚，这比英国撤军要复杂得多，爱尔兰不可能在分裂中获得自由，如果不在统一共和国成立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民族解放。长期以来，这一直是爱尔兰革命左翼的论点，贝克尔和他的同伴在向其他城市游击队扔泥巴时，坐在了右边。如前文所述，消耗战缺乏人民战争的广度和野心，因此为爱尔兰解放进行人民战争的口号是唯一有革命根据的口号。两个爱尔兰国家都需要被粉碎，把“共和国”纳入这个国家，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实现解放——这就是毛主义所教导的。贝克尔需要的只是理顺城市游击战可以获得和保持群众支持的事实。

贝克尔举了一个“做群众的尾巴”的例子，声称：

“伯明翰[英格兰]群众起义一天，对帝国主义者造成的物质破坏，是他们多年的城市游击战的一百倍 ”[12]

我们必须挠头，想知道这里所说的“物质损失”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他说的是财产损失，那么很明显，多年以来爆破建筑的总结果要更经济。如果他说的是政治损害——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因为两者都没有党的领导，一个有能力把斗争与夺取政权的长期需求融合在一起的党的领导。我们有的只是美革共一直以来都犯有的一种奇怪的崇拜，那就是在他们的日常组织中坚持合法主义，然后去干预与他们毫无关联的自发反抗。这种态度在贝克尔的论证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观点同样犯有未能与反抗中的英勇群众建立联系的错误。右派利用像红军派这样的团体的真正错误来提出比这些团体的错误更糟糕的论点，这是特别可鄙的。我们的考虑，必须基于组织的需要，具体地说，要考虑一种既掌握非法斗争又保持群众联系的组织方法——本质上就是共产党。

不出所料，教条主义者认为，先锋队的作用只是准备，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不能包括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准备：

“对革命者的要求不是让他们退缩到孤立的破坏和暗杀行动中，而是要提高他们自己的能力，在政治上把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锻造成先锋队本身。”[13]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绝不能来同破坏和暗杀作平衡，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就像武装斗争条件下的武装宣传与党的建设的意义的讨论一样。把无产阶级阶级的意识在政治上锻造成先锋党本身，这种模糊不清的方案是完全不够的，这主要是因为组织是由人而不是意识组成的，意识本身并不决定现实，而是现实，主要地是生产关系，决定意识。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塑造阶级意识和共产党人的主要催化剂，共产党人重建或建立自己的党。通过平衡这两个本来就相互依存和互利的概念，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只不会猎杀的狗，一件比城市游击队的教训更无用的事。

贝克尔和其他人当然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欧城市游击队在20世纪80年代正在衰落，这是事实，但在这方面并不是只有他们是这样的。所有之前的主要修正主义政党在美国和西欧也都在萎缩，反修正主义的新左翼和新共产主义运动团体也无一例外地在萎缩。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秘鲁人民战争和秘鲁共产党正在具体化毛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衰落和崩溃同时发生的马列毛主义的兴起，这将使真正的反修正主义政党和组织走上发展壮大的正确道路。正如贡萨罗所指示的，必须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分析而不是谴责。从谴责、冷嘲热讽和蔑视的观点，像贝克尔那样继续下去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毕竟，贝克尔的评价方法并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科学，马列毛主义必须描绘出完全不同的图景。许多年过去了，像贝克尔这样的雇佣文人还在做着同样死气沉沉的、主观主义的“分析”，没有抓住造反动派的反有理和仅凭马列毛主义就可以纠正各种城市游击队犯下的历史性错误的基本真理。意识形态比枪支、炸弹或法律更重要。

贝克尔通过故意歪曲红色旅关于阿尔多·莫罗绑架案的路线，企图诬陷红色旅是改良主义，声称他们的唯一意图是破坏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 然而，他的立场不足以理解红色旅将这一策略纳入了他们进攻国家心脏的政策的行为；他们认为莫罗作为天主教民主党的历史领袖以及意大利前总理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其广度远胜于确定议会的组成成分。根据红色旅的说法，天主教民主党是“目前的主要敌人”，他们必须被“清算、击败和分散”，绑架策略没有达到这些目标，但却帮助了这场运动的战略，这在增加天主教民主党的内部矛盾方面取得了成功，许多天主教民主党人公开表示或多或少希望莫罗被处决，因为他们担心在红色旅的审问下莫罗会把一些丑闻泼到他们身上——这就分裂了他们的党。（注：这里应该是指天主教民主党内部各派救莫罗还是不救莫罗的分裂，显然相较于红色旅，天民党派阀安德烈奥蒂更希望莫罗被处决）

与红色旅的实际立场相反，贝克尔表示：

“当红色旅为了影响意大利议会的组成成分而处决莫罗时，他们用枪告诉无产阶级的是，‘打击国家心脏’的真正政治内容是让一个党，而不是另一个政治联盟来执政。”[14]

红色旅并不主要对莫罗竞选议会的结果感兴趣，相反，在确定他是最好的目标后，红色旅试图用莫罗的生命来交换革命者的生命。这是红色旅为了审判莫罗的罪行而举办人民法院时进行的一种战术考虑，目的是将政治犯的苦难政治化，并在天主教民主党之间制造摩擦，根据红色旅的说法：

“他深知自己是这个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对帝国主义霸权强加于我国的反无产阶级政策、对生产力的压制、对工人剥削的状况、对整个无产阶级阶层的边缘化和苦难、失业、对天主教民主党发动的武装反革命负有最高责任。”

以人民法院为武装宣传服务的角度来看，莫罗是一切反人民罪行的象征，因为从形式上来说，他是帝国主义的头目。在关于交换囚犯的问题上红色旅表示：

“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得到了推进，可见，是有两个目标的——把国内矛盾推向极端；——为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一条道路。这两个目标都已经实现了。”

红色旅在莫罗选举前发布的往期公报中总结了他们的对武装宣传的理解：

“在敌人阵营内制造最大数量的政治矛盾[如在主要修正主义者和天主教民主派之间播下分歧]，即将其肢解，使它不能发挥作用；”

“用尚不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斗争方法，为抵抗运动扫清一条道路；”

“在各战线上，把先进的阶级阶层组织进党和全阶级范围的战斗组织中去。”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和贝克尔肤浅的分析是相符的。更进一步地，贝克尔声称，红色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审判和处决资产阶级头目来从根本上改变局面，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策略包含了这样一个真理的核心，即这种行动分裂了一个争吵的资产阶级，这是任何人民战争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普遍的组成部分。贝克尔指责红色旅把范围缩小到少数人身上仅仅是为了取悦群众，他致力于拒绝帝国主义中心的武装斗争，即使是其中有用的部分。我们发现，我们与贝克尔之间的一致或共有的政治立场，主要是因为他贩卖毛主义概念，已经在本文中概述了，这只是巧合，不是任何真正的政治统一。

贝克尔声称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这比城市游击队的概念还要庸俗：

“千千万万的群众自己，不仅拿起了最终打击和粉碎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的枪，而且还有了这样一种认识，这种认识能以一种不会导致另一帝国主义剥削者代替这一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方法而指导他们做到这一切。”[15]

多么唯心主义啊！可以说，共产国际的起义战略，特别是迄今为止的一切人民战争，从来没有从千百万群众在武装斗争开始时就必须拿起武器的方案出发。这样的方案将使中国的人民战争只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游戏，秘鲁的人民战争永远不可能从安第斯山脉开始，发展到利马等的贫民窟。许多城市游击队犯下了种种错误，但他们强调了一个被贝克尔掩盖的真理，即武装斗争需要发动才能发展壮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正是毛发表著名声明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16]

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必须命令革命者建立或重建党，尽快发动人民战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今天，世界上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正准备这样做，以帝国主义中心城市游击队的经验以及我们阶级历史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斗的经验为基础。这些人今天可能为数不多，但正如毛的乐观主义所正确坚持的那样，他们将迅速增长，这不是在等待中，而是在战斗中，在与阶级敌人的武装对抗到发动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每一步中得到实现！

[1] Beck, Chris Aronson. “Strike One to Educate One Hundred,” Chapter 3. 1986. Seeds Beneath the Snow Publication.  
[2] 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对红色旅历史的几点思考》，M-L-M Mayhem, 2019年6月14日。  
<http://moufawad-paul.blogspot.com/2019/06/some-thoughts-on-memory-of-red-brigades.html>  
[3] 同上。  
[4] 奥斯汀红卫兵。《美国毛主义路线斗争会议文件集》，《迈向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2018年。  
[5] Beck, Chris Aronson. “Strike One to Educate One Hundred,” Chapter 10. 1986. Seeds Beneath the Snow Publication.  
[6] 红军派。《城市游击队概念》，第五部分城市游击队。Kersplebedeb Publishing, 2009.  
[7] Coogan, Tim Pat. “The IRA,” p. 420 The Green Book: 1.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8] Becker, P. A World To Win Magazine. Issue 4, 1998.  
[9] Smith, J, Moncourt, Andre. “The Red Army Fac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Projectiles for the People.” Chapter 3, Taking Up the Gun. Pg. 98.  
[10] Becker, P. A World To Win Magazine. Issue 4, 1998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号。